

此书在手，全球经济的未来必将了然于胸。

乔治·索罗斯

# 资本主义4.0

## 一种新经济的诞生

[英]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著

胡晓姣 杨欣 贾西贝◎译

# CAPITALISM 4.0

## The Birth of

# A New Economy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资本主义4.0

一种新经济的诞生

[英]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著

胡晓姣 杨欣 贾西贝◎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 / (英)卡列茨基，胡晓姣，杨欣，贾西贝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4

书名原文：Capitalism 4.0: The Birth of a New Economy

ISBN 978-7-5086-2699-4

I. 资… II. ①卡… ②胡… ③杨… ④贾… III. 金融危机—研究—世界 IV. F8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30700号

Capitalism 4.0: The Birth of a New Economy by Anatole Kaletsky

Copyright © 2010 by Anatole Kaletsk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资本主义4.0——一种新经济的诞生**

ZIBENZHUYI4.0

著 者：[英]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

译 者：胡晓姣 杨欣 贾西贝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 字 数：332千字

版 次：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0-4094

书 号：ISBN 978-7-5086-2699-4 / F·2273

定 价：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mailto: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世界末日并未到来。尽管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充满了这样那样的灾难预言，我们还是平安无事地度过了21世纪的前十年。全球最富声望的经济学家们所预言的那些暴动、（救济贫民、灾民等的）施粥所以及破产等现象并未出现。尽管人们对“资本主义”这个词看法不一，但没人愿意看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然而，资本主义体系的幸存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重拾危机前的信心。2008年9月15日发生的雷曼兄弟破产事件使人们再也无法相信金融市场的智慧，无法相信自由企业的效率。直到2010年中期，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才有可能恢复到令我们满意的程度，但这种恢复是否意味着政治家、经济学家和金融家能像从前一样各就各位呢？全球化仍将继续，很多国家将会逐渐恢复到危机前的繁荣状态，但人们不会轻

易忘却 2007~2009 年这场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创伤。危机的经济代价是几十年也还不清的债务，这些债务给纳税人和政府预算造成财政困难，使那些无业者难以维持生计，打碎了房产拥有者和全球投资者的美梦。

2008 年 9 月 15 日那一天所崩溃的，绝不仅仅是一家银行或者一个金融体系。那一天崩溃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和经济体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拿什么来替代 2008 年秋天土崩瓦解的全球资本主义。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全球资本主义只能被全球资本主义替代，别无他选。2007~2009 年的金融风暴既不会破坏也不会削弱人类的根本欲望——雄心壮志、创新精神、个人主义以及竞争精神，人类与生俱来的这些特性一直推动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而今这些特性将被重新利用，被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创造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这一新型的资本主义将会比它所替代的原有的体系更加成功，更具创造性。

本书作者的写作意图就是分析整个金融重建的过程，厘清复兴的资本主义体系最重要的特点。这一体系的转变要历时许多年才能完成，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转变所带来的一些重要结果了。过去一年的经历告诉我们，这些结果与两股相反的政治势力在危机高峰时所作的虚无的预言有着明显不同。反对资本主义的左翼阵营似乎坚信几个星期的金融混乱就可以瓦解一种政治经济体系，而这一体系 200 年来经历了多场革命、多次经济萧条和几次世界大战都未曾消亡；支持自由市场的右翼阵营则坚持认为，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会毁掉私有企业（但很明显这些措施是拯救这一体系的必要举措），很多人仍然认为，如果当初各国政府允许金融机构解体，这场危机可能会得到更好的解决。要重新对这场危机作出平衡的评估，就必须对左翼的狂热夸张和右翼的骄傲自大提出挑战。

本书没有把全球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归咎于贪婪的银行家、不称职的监管者、容易受骗的房主或者愚蠢的官僚，而是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展示这次金融危机。本书从经济改革和地缘政治动荡的角度重新解析了这场危机，自 18 世纪末以来，上述两种因素就一再改变着资本主义的性质，最近的一次是 1979~1989 年 10 年间的“撒切尔-里根”革命。本书的中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从

来就不是一个遵循固定规则的静态体系，因此在这一体系中政府和私有企业间的责任划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与现代经济理论的各种学说相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控制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永恒定律。事实上，资本主义是一种适应性体系，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当这一体系受到深刻危机的严重威胁时，便会演变为一种更适应新环境的新形式，以替代原有的形式。

资本主义不是一套静态的机构，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体系，这一体系通过各种危机为自身注入新的活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看待2007~2009年间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是资本主义发生第四次彻底转变的催化剂，正如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促成了第三次资本主义转变，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催生了第二次资本主义转变，而1803~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则是第一次资本主义转变的基础。因此，本书得名《资本主义4.0》，即第四代资本主义。

上述几个重大变革中的第一个时期——美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及英国的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及经济动荡时期——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纪元，这一时期包括从1815年英国击败拿破仑取得英法战争的胜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近100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整体相对稳定，处于蒸蒸日上的繁荣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及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这一局面才被打破。这几场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和经济变故破坏了19世纪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一新体系融入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以及英国和欧洲的福利国家等新的做法。然后，在经济大萧条爆发40年后，另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20世纪60~70年代的全球性通货膨胀——推动了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和罗纳德·里根总统倡导的自由市场革命，开创了第三代资本主义，这一新体系与前两种资本主义体系截然不同。20世纪6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发生40年后，也就是2007~2009年间，又一场全面爆发的危机袭击了全球经济。本书认为，此次危机将会开创资本主义体系的第四种形式。里根总统与撒切尔首相所设计的蓝图不同于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同样，这次危机所开创的新型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撒切尔-里根”革命的结果。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不断演化的体系，其经济规律与政治制度总会经历深刻的变化，危机前后的思路会发生矛盾，有时立场甚至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的“撒切尔-里根”革命已被普遍视为一种对真正的资本主义的重新发现，而且一些最保守的政治家和企业领导者至今仍然坚持这一观点。然而，从事物发展的过程来看，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即从1980年到2009年短短30年的时间，相对于18世纪末兴起的现代资本主义漫长的发展史而言，真是微不足道。以这种历史视角来看待最近发生的事件，将会对这次危机及其后果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

例如，很多政治家和企业领导者认为，政府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会扰乱自由市场体系。他们原则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干预。这种狭隘的观点的确有些荒唐，因为资本主义在里根和撒切尔之前已经历了漫长而辉煌的发展。政府与私有企业之间以及各种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这种动态关系一直是资本主义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演变最鲜明的特点——最早是在19世纪初，接着是20世纪30年代，然后是20世纪70年代，今天又再次发生了。每经历一次演变，资本主义体系都会比从前更加牢固。要了解由这次危机催生的政治经济新模式，就要考量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前三个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动态关系。

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是泾渭分明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合作仅限于征税和消除贸易壁垒，前一种合作主要是为战争筹款，后一种合作大多数时候是为了保护政治利益。紧接着，从1932年开始，罗斯福“新政”和社会民主的欧洲福利国家出现了。为了应对俄国革命和经济大萧条，第二代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人们对仁爱而又全能的政府抱有无限信任，而对市场却存有本能的不信任感，特别是金融市场。第三代资本主义由1979~1980年的“撒切尔-里根”政治革命开创而来，其观点与第二代资本主义截然相反，这一次的主要特点是神化市场，而对政府的态度却是不信任。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种变体——本书称之为资本主义3.3的那种由金融主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极端地发扬了第

二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3.3不仅不相信政府，而且妖魔化政府，嘲弄规章制度，甚至公然藐视公共管理。这种极端的反政府思想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引发了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正如卡尔·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第三代资本主义最终被自身反政府思想的矛盾所摧毁。

资本主义3.3的自我解体为政治经济演变的下一阶段——资本主义4.0——留下了空间。与第三代资本主义的形成相同，此次演变将会重新定义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7年金融危机近30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而政府几乎总是错的。而此前的那个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20世纪30~70年代——则认为政府总是对的，市场却几乎总是错的。因此，资本主义下一个阶段最鲜明的特点很可能是这样的：政府和市场都有可能是错的，而且有时候它们的错误可能是致命的。

这种观点乍一看好像令人震惊。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它在政治和商业中引入了领导力、创造力及实验研究等新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上一代资本主义不愿接受的。承认政府与市场都存在问题，意味着政治与经济要携手合作，而不是像第三代资本主义阶段那样关系交恶。第四代资本主义形成之初，科技、全球化以及社会变革所带来的非凡机遇都表明，如果美国和欧洲崛起的新一代政治家和企业领袖能够打好手里的牌，那么这一新的经济模式就会远远超越第三代资本主义。也许有朝一日这一模式会被称为“奥巴马经济”。然而，如果美国和欧洲不具备必要的思维灵活性，从而导致第四代资本主义失败，那么未来几十年的政治经济或许会受制于其他新型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由西方势力所掌控。

如果西方国家奋起迎接挑战，它们就要将2007~2009年的这场危机及其前因后果视为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资本主义演变的动态过程。这就是本书第一部分将要呈现给读者的内容。

本书第二部分从历史及发展的视角讨论了这场危机以及危机前的繁荣景象。传统观点认为，此次危机之前全球住房及借贷产业的繁荣只是负债消费的幻象，本书驳斥了这一观点。恰恰相反，本书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消费者



借贷与资产价值的大幅增长是对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良性经济发展趋势的理性反应。而这些经济趋势的最终形成源于1989年集中出现的几项重大技术革新和地缘政治演变：苏联解体，亚洲崛起，电子科技革命以及全球各个国家广泛接受没有黄金、白银、外汇储备或其他客观价值符号支持的纯纸币。

危机前的良好趋势催生了过度的投机，导致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繁荣—衰退”循环模式的出现，这种循环会长期存在，但是这种情形与“危机之前大多数贷款和资产价格增长是非常合理的”这一观点并不矛盾。“繁荣—衰退”的循环模式长久以来一直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特点，将来也不例外。导致此次危机的事件与导致此前几次“繁荣—衰退”循环的事件如出一辙，但没有过去的事件那么极端。那么，为什么这种循环模式能够在这样一场严重的灾难中达到顶点呢？

第三部分将会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讨论将会围绕对某一经济理论的一种夸张而单纯的解释展开，这一理论将“撒切尔—里根”时期和克林顿时期得到广泛应用的自由市场经济推向了荒唐的极端。这种对经济政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解方式使一次普通的（或许是严重的）“繁荣—衰退”循环演变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更确切地说，市场原教旨主义曾支持布什政府的政策性失误，特别是其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失误，那才是导致这次金融灾难最直接的原因。这个世上最强大、最富强的政府怎么会存在如此多的灾难性错误呢？很多错误都可以归咎于经济学理论与政治观念之间的恶性互动，两者就像一对哈哈镜一样，总是夸大对方的错误和偏见。结果，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立的古典经济学被无限夸大，成为有效市场、合理预期以及中央银行等主导全球政府机关、立法机构以及金融企业经济思想的信条。第三部分的结尾提出一个论点：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模式要想成功，就必须创造新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应超越合理预期和有效市场等迂腐的假设。

在重新解读过去与现在的基础上，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论证了第四代资本主义在未来10年形成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新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如果说2008年秋全球经济遭遇的诸多问题有一个共同主题的话，这个主题

就是将完美市场视为一种准宗教教义，并且笃信有效政府和自由市场在这个世界上无法共存，势不两立。在各国银行提供紧急援助和美国政府接管通用汽车公司之后，那种认为政府干预对私有企业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理念便不攻自破了。自由市场和小政府也不再是应对资本主义体系所面临的所有挑战的可靠方案。

有个象征性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艾伦·格林斯潘作为崇尚自由市场的典型人物安·兰德 (Ayn Rand) 的忠实门徒，在2009年8月作了著名的国会证词，对于严肃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此次事件标志着政府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的亲密关系走到了尽头。在被问及自由市场理念是否已被证实存在极大的缺陷时，格林斯潘答道：“是的，我发现了一个缺陷。我还不清楚这个缺陷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但是我对这个事实深感沮丧……是的，我的确发现了这一理念的缺陷。这也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因为我曾历时4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利用大量证据来证明自由市场的运行是相当好的……我们原本认为私有企业的利己主义会推动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因此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震惊，尤其是我本人。”

安·兰德也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个缺陷的本质作了恰如其分的界定。这篇文章是关于客观主义哲学的，这种哲学激励着格林斯潘和美国的其他保守主义者，影响了整整两代人。她写道：“理想的政治经济体系就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一个完全资本主义的体系应当实现（但是，历史上从未实现过）政府与经济的彻底分离，这与政府与教会分离的方式和原因一样。”

但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早就发现，事实恰好相反。任何一个单纯靠市场激励机制发展的社会，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会遭遇惨败。当今世界最自由、受市场激励最大的市场经济其实不在美国或者中国香港，也不在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天堂，而在索马里、刚果以及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在为成功的资本主义创造条件时，政治制度的关键作用在很多社会学术研究著作中都有论述，比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以及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的《新教徒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里根”

革命以后，为了支持像安·兰德这样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拥护者所提出的过于简单的假设，许多企业领袖、理论经济学家以及保守派政治家决定对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所描述的历史事实忽略不计。其结果便是政治和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准宗教的二元关系，这种关系在雷曼兄弟危机中被证实是无法持续的。

无论是金融市场、消防工作还是公共场所急救设备的配备，政府安全网络无处不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自然而必要的特征，那些被迫利用公共资金支持私营银行的政治家们对此无法再予以否认。而被推到失败边缘的各家银行也承认，它们对风险的漠视以及“按劳分配”的激励文化已经不只是其股东、经理和员工之间的私事了。那些因为依赖金融市场的有效和理性而遭遇惨败的投资者也无法再自欺欺人地说什么基于市场的金融法规与会计原则通常要比政治和立法更可靠。以上种种因素导致的结果便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关于政府及私有企业之间的对立的观点无法得到支持。

目前出现的这一新型的资本主义将会从根本上扭转安·兰德的客观主义理想。第四代资本主义不是将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截然分开，而是进一步增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市场和政府都无法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成功机制，那么将个人激励与政治决策加以平衡的体系便体现出了其优越性，这一体系的实施效果通常优于市场或公共机制。

第四代资本主义将会认识到，各级政府和各类市场之所以会犯错，并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家腐败、银行家贪婪、企业家无能、选民糊涂，还因为这个世界太复杂、太不可预见，因为任何一种决策机制——不管是建立于经济激励机制之上还是政治激励机制之上——都无法自始至终地保持正确无误。因此，实验方法与实用主义就必须成为公共政策、经济领域以及企业战略的指导思想，即便这种思想意味着一致性与连贯性的丧失也无妨。

通过试错法在错误做法造成太大的社会危害之前加以纠正，这种能力是市场机制最大的优势。未来几年内，我们必须在政治决策和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等领域推行一种类似的实用主义。政界及企业界领袖们似乎已经投入这一学习过程之中了。以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为例，他号召自己的

经理们“成为善于应付混乱情况的系统思考者”。奥巴马也倡导“一种新的、更加务实的做法，这一做法关注的不是政府的大小，而是它是否英明高效”。但是，当这些政治和企业领袖逐渐认识到我们正由一个理性的、可预知的世界变为模糊不清的、不可预知的、逻辑混乱的世界，经济学家们却在为危机前的理性和有效市场理论进行辩解。经济理论与商业实践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

危机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竞争市场会自动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金融循环对长期经济运行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正常运行的私有企业经济总会保持充分就业的状态，只有一项重要任务留给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即确保通货膨胀可控。而这次危机却驳斥了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所有假设。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循环、间或发生的信贷危机以及自我增强的经济萧条是任何市场体系都会具有的自然而频发的特征。反过来，这就意味着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必须对增长与就业、维护金融稳定以及保持通货膨胀可控承担更大的责任。

这些重大的新责任或许意味着政府规模会变得无限庞大，当然，花的是纳税人和私有企业的钱。但是第四代资本主义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到那时，不管其责任和影响如何扩大，政府规模都必须压缩。其中部分原因是危机和增税的政治阻力造成的赤字规模在很多国家已经逼近公众能够接受的极限。第四代资本主义公共部门的规模压缩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大政府官僚僵化，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从全民医疗保险及能源自给自足问题到稳定地提供抵押贷款服务的金融体系以及提高工资的问题，所有这些复杂的需求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竞争市场的利润激励机制才能满足。然而，政府在管理这些市场、为追求赢利的企业创造激励机制时，其角色总会发生转换。

很明显，金融监管将会收紧，但是第四代资本主义意味着市场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将发生众多转变，政府与企业间原本泾渭分明的责任分界线将会变为灰色地带。不同国家的政府和市场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所以情况就更加复杂。例如，美国政府将会出台更多的法规以控制暴涨的医疗费用；而在英国，医疗保险则主要以市场为导向，私人融资更多，市场竞争更激烈。抵押融资在英国

管制较多；而在美国，政府干预和补贴则少得多。发达国家（瑞典和丹麦两国位列其外，它们的私有学校教育已十分普遍）的教育将更具有市场导向，而在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免费的国家教育仍然任重而道远。

上述这些矛盾——例如医疗保险向公私混合模式发展的趋势——也许暗示着我们可以寻求“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折中的方法，对美国的市场体系与瑞典的社会民主之间的区别进行简单的划分。但事实并非如此。认为一些国家或部门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需要较多的市场调控和较少的政府干预，而另外一些国家或部门则需要较少的市场调控和较多的政府干预，这种想法是再正常不过的。

第四代资本主义的公共政策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是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制定一种恰当的标准，例如，在可接受效率范围内对替代能源进行补贴，对贸易进行调控但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对医保和教育加以管理但不否认自由选择。尽管这些再次平衡公私利益的问题解决起来很复杂，但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必须面对的挑战。

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和国际声望，这种情形令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人们对“撒切尔-里根”时期“自由市场创造自由的人”这一乐观口号不再深信不疑。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趋同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无论是从企业经营、经济政策、政治权利还是地缘政治利益来看，在这次危机之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距离都越来越大。也许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会发生严重的冲突，但是事实证明这两种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多方面都是差别很大的。在企业经营方面，中国的法规和产业战略对民族产业的扶持逐渐加大；在经济政策方面，在为美国和欧洲消费者提供廉价产品的同时，中国决定保持巨大的贸易顺差，维持汇率贬值，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债务会不断攀升，半熟练制造业岗位会持续减少。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自信使其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态度越发坚定。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为新兴国家发展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模式提供了一种真实的选择。

西方世界因此有了一个选择。西方可以接受东方人的观点，承认有着五千

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拥有比西欧或美国凝聚力更强、发展更持久、更加成功的社会。从这一角度来看，21世纪的中国只不过是为其文化价值和民族利益重新树立起全球领导者的地位。或者，西方也可以选择本书所提出的方案：以行动来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比中国的体制适应性更强、更持久。然而，西方世界必须承认，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整个世界观造成了冲击，同时还要认识到，在2007~2009年的危机之后，西方世界急需重建西方社会政治模式。

如果进行了必要的改革，以美国为首的民主资本主义将会再次成为全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最成功、最具吸引力的政治经济模式——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在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必须恢复充分就业和强劲的经济增长。西方世界要迎接中国的挑战，就必须证明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会放缓、人民生活水平将会停滞不前等预言是错误的。

2009年，著名的学者及金融家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 (Mohamed El-Erian) 创造了一个短语“新常态”来描述萧条的经济状况，他本以为这种状况在危机后会维持很多年，甚至几十年。埃利安认为，这种新经济环境的特点是经济活力、就业及赢利水平持续低迷，因为过度借贷的人为激励机制已不复存在。如果他的这一预言被证实的话，人们就会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存在产生严重的质疑。

关于经济增长将持续低迷这一观点来源于一种假想，即危机前时期所创造的很多额外财富其实都是海市蜃楼，是虚妄的。这一假想在当今世界被广为接受。然而，这些保守的政治家、金融家和企业领袖只是对危机前时期的信贷扩张进行了强烈指责，认为那是一种欺骗和假象，但他们好像从未考虑过这种说法的逻辑含义——如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都是虚妄的话，那么号称创造了这种假想财富的自由市场改革必然也是虚妄的。

据称，通过开创本书称之为“第三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系，罗纳德·里根总统与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曾经成功逆转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恶化趋势。但是危机后人们却普遍认为，

“撒切尔-里根”改革只不过是金融泡沫来掩盖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而已。如今，这些虚幻的泡沫已经破灭，我们才得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杠杆上升期内所创造的实际财富和产能其实少之又少。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看来，自由市场时期所创造的实际财富比 20 世纪 50~60 年代以政府为主导的高税收资本主义时期所创造的财富少得多。

如此看来，解决 20 世纪 80 年代多次阶级冲突的那些方案也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把戏，因为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在自由市场时期的大大部分时间里是每况愈下的，而其贫民化趋势却被资产价值的虚假膨胀和抵押债务的不断增长所掩盖。当这座高筑的债台轰然倒塌时，中产阶级和穷人就会发现自己在自由市场改革中获益很少，甚至可以说一无所获。假如真的如“新常态”所设想的那样，危机后的经济条件与危机前相比更加恶化，中产阶级必然会得出结论：“撒切尔-里根”时期的自由市场改革使他们的境遇比“凯恩斯黄金时代”更加糟糕。

这种世界观意味着自由市场体系气数已尽，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下一阶段必然会明显地向左转。然而奇怪的是，支持这种危机解读方式的人竟然是那些保守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嘲讽“撒切尔-里根”时代所谓提高生活水平的残酷骗局的同时，他们仍继续赞颂这一时代的各种好处。

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宣称，自由市场的症结从未得到对症的治疗。他们认为，如果采取比里根、撒切尔和乔治·W·布什的做法更具进攻性的手段来处理官僚、法规和福利问题的话，经济增长应该会更强劲、更稳定。但是，这样的观点注定是站不住脚的。经过 30 年的实验，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最小化的模式最终宣告失败，很难想象民主社会将会支持放松管制和自由放任等更加激进的政策。激进主义比自由市场中的其他实验更有可能恢复 20 世纪 70 年代政府主导的那种现代资本主义形式。

然而，在接受这种令人沮丧的前景之前，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切完全是建立在假想的基础之上的，即危机后的“新常态”将会导致生活水准停滞不前，资产价格持续走低，经济增长缓慢无力。本书的观点则认为，如果各国银行和政府改变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保持利率一直处于最低水平，那么全球经济应该

能够得到快速恢复。本书还认为，与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显著情绪变化与政策失误相比，促成危机前时期金融迅猛发展的长期趋势将会表现得更强劲、更持久。如此看来，与危机前的几十年相比，“新常态”将会成为经济增长更快、生活水准更高的阶段。在这次战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的低谷出现一年之后，消费者、房屋所有者和政府都还在债务中垂死挣扎，这种预言似乎荒唐之极。但这种说法真的是胡言乱语吗？

即便私有企业和普通百姓在危机过后不愿意马上花钱，政治家和中央银行家们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可谓花样百出——（贷款）零利率、开放式信用担保、政府财政刺激政策以及无限制地增发货币等等。按照危机前时期的经济学说，上述各种手段根本不会奏效，因为政府为推动经济增长所采取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总是以失败告终。但是，随着第四代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假设开始让位于对经济学更加实用的理解。全球的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他们可以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内使利率保持或者接近于零，可以通过政府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创造就业机会，可以控制汇率来推动出口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可以使用各种税收激励机制、补贴和调整政策来鼓励私人投资。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经在2010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作过以下预言：“历史学家在未来回顾2010~2019年的经济数字时，如果这些数字没有远远超出2000~2009年的经济数字的话，我肯定会大吃一惊。如果能够修复各种存在缺陷的体系，我们就能够为美国人民提供比过去10年好得多的经济成果。”当时没人在意他的这番言论，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在2007~2009年的金融过度之后，生活水准停滞不前和经济增长疲软的“新常态”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在道德上更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如果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运用经济手段来应对——如果政界和企业界领袖抓住伴随新型资本主义体系出现的各种机会，萨默斯那番话所表达的乐观想法是有可能得到合理论证的。

如果事实证明未来的10年确实比刚刚过去的10年更加繁荣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撒切尔-里根”时代所倡导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只是一种令人怀疑的



谎言，金融资本主义不只是庞氏骗局，危机前几十年所创造的财富不只是狂热的幻象，科技革命、亚洲崛起以及金本位的废止也不会只是白日梦，而会成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这些都是本书要讨论的基本问题。

但是，如果世界经济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再度振兴，我们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演变也没有实现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如果真是那样，美国和欧洲的财富和权力肯定会加速向亚洲转移，西方金融体系就会处于危机边缘和不稳定的状态。保守的企业观要求私营企业拥有无限的自由，然而劳动者和选民却得知自己要勒紧裤腰带为引发灾难的前30年的自由企业改革埋单，在这种环境中，各派的政治意见不可能达成一致。如果真是那样，一种不同于本书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的新型资本主义——一种建立在集权主义制度之上、而不是西方民主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必将雄霸世界。

那么，哪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会占上风呢？到2010年年中，在“二战”后最深刻的经济衰退低谷出现一年之后，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确切的答案。奥巴马政府的早期乐观态度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寸步难行。在美国，出现新的政治方向的希望已十分渺茫。在欧洲，单一货币区域基本处于崩溃边缘，英国的政治前景比从前更加变幻无常，日本则梦游一般进入了自己第三个迷失的十年。在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唯有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浴火重生，比从前更自信，也更强大。在这种状况下，要相信新型资本主义会赢得最终胜利需要极大的信心。凡事皆非注定，经济领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的确如此。

在过去的40年里，曾有几十次相对较小的事件极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改变全球的经济环境。想象一下，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失去苏联的掌控权会怎样？如果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瞄准罗纳德·里根胸膛的子弹位置稍稍高出一英寸会怎样？如果阿根廷没有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会怎样？如果佛罗里达州的“悬空票”没有落在乔治·W·布什身上而是落在艾尔·戈尔身上又会怎样？

诚然，上述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它们能改变历